

大安出版社四十週年社慶叢刊

王安石新學探微

夏長樸◎著



夏長樸 著

王安石新學探微

大安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安石新學探微 / 夏長樸著。 -- 一版。

-- 臺北市：大安，2015.03

面；公分

ISBN 978-986-7712-65-3(平裝)

1.(宋)王安石 2.學術思想 3.儒學

125.16

104003772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王安石新學探微

著者：夏

長

樸

發行人：蕭

淑

卿

發行所：大

安

出

版

社

電話：(〇二)二三六四三三二七

傳真：(〇二)二三六七二四九九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

二樓(100)

郵撥帳號：一〇一〇三八七七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二〇一五年三月 一版一刷 0001~03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五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7712-65-3(平裝)

大安出版社 四十週年 社慶叢刊

大安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出版人文研究、教學用書為宗旨，迄今四十年。社員深幸當初作夥結緣之初衷未改，故特別推出「四十週年社慶叢刊」多種，一則紀念友誼，二則共饗海內外同好。

序

王安石是北宋時代的重要人物，身為政治家、文學家，他的成就後人耳熟能詳，要說他是思想家，學術成就極高，在當時影響很大，知道的人恐怕不會太多。民國以來，除了時間較早的梁啟超的《王安石》、柯昌頤的《王安石評傳》之外，當代首先將王安石納入思想史研究對象的學者是侯外廬，在他的巨著《中國思想通史》中，侯外廬特地為王安石立了一篇專章：〈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分別探討了王安石的新學的學術地位、修撰《三經義》與《字說》、新學基本著作和新學學派、王安石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人性論和認識論，以及王安石的社會經濟思想和熙寧新法等，並因此判定王安石是一位中世紀進步的改革家。稍晚的鄧廣銘與漆俠，更分別出版了不止一部有關王安石研究的專著。中國大陸之外，日本學者佐伯富的《王安石》與東一夫的《王安石新法の研究》都是資料豐富、論證嚴謹的專著，在王安石的研究上也有頗高的參考價值。由於侯、鄧、漆氏這些學者在學術界的地位崇高，門下名家輩出，影響力廣泛，這些專書出版以後，流風所及，大陸有關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重

要著作，幾乎無一不談王安石的思想或哲學，甚至哲學大家馮友蘭，在他修正改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也特意增加有關王安石哲學的討論。足見在政治與文學之外，當代學者已完全肯定王安石思想的重要性，承認王安石新學在宋代學術史有其一席之地。

王安石思想與其新學在宋代學術史上有何重要特色與影響，值得學界如此重視？簡而言之，大致有下列幾點：

第一、王安石注意道德性命之學的探討，而且強調事功必須建築在「窮理盡性」的基礎上，這種貫穿內聖外王的主張，雖然其來有自，卻為以下的學術開啓了新的面目。王安石雖非道德性命之學的首倡者，但透過「新學」的傳播與發揚，使得道德心性成為後來學者不能不關心的問題，王安石重視心性之學的治學取向，經過新學的大力提倡，成為當時沛然莫之能禦的學術主流。就連新學的主要競爭對手道學，自二程下迄南宋的道學家，雖然抨擊王氏新學不遺餘力，但他們的論述其實也有頗多受到安石影響之處，這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第二、王安石新學的核心著作《三經新義》透過學校的學習，科舉的考試，成為士子們人必讀的作品。稍後完成的《字說》純以會意說字，雖未立於學官，也因安石學術廣受注意的關係，成為當時的顯學。《三經新義》在著作形式上擺脫了漢唐註疏的固定格式，直接注解古人的典籍，不受漢唐註疏的約束，這是經學著作形式的一個改變；《三經新義》強調解經的目的在於義理的掌握，就解經而言，是經學研究的一大突破，徹底轉變了經學研究的方向，這是

宋代經學迥異於此前傳統經學的重大改革，所謂「宋學」也因此而建立。南宋末的王應麟曾說：「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劉敞的《七經小傳》是開宋人說經新風氣的第一部著作，王安石的《三經新義》雖時間稍晚，但由於列在官學的關係，影響既廣且深，遠在《七經小傳》之上，這是完全可以確定的。

第三、王安石揭舉「經學正所以經世務」，重申的是孔子建立的儒家傳統，再次復活了兩漢注重「經世致用」的學風，但其思想內容其實相當不同於過去的儒家學者。安石雖然上承孔孟內聖外王同時兼顧的一貫之道，卻不故步自封墨守陳規，他重視道德心性，從心術分辨王霸，主張盡性窮理，強調順時應變，無一不具推陳出新的創意。這也使得他的性情論、聖人論、君臣觀獨樹一幟，大異於前人與同時學者，雖然因之遭致頗多批評，甚而謾罵與污蔑，但卻無損於其學術的價值。

就此而言，王安石新學的學術價值自然可以肯定，將近千年的忽視不顧，其實是學術研究的極大損失。也因為如此，當觀點調整之後，學術視野因之而有所不同，因而近二十年來有關王安石及其新學研究的論文與著作即絡繹不絕的大量出版，掀起一股研究王安石的風潮。這些論文與著作著眼各有不同，或通論王安石的思想，或專研王安石早期的學術思想，或探討王安石新學，或比較王安石新學與理學的關係，或探討王安石新學與文學成就，雖各有著重，觀點

亦有不同，就研究王氏新學的各方面而言，皆各如其分，也都有其參考價值。

學術本以求真，學術史的研究更要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要做到求真與精確，除了理論與方法必須講求之外，最基本也最切要的就是研究對象資料的完整與真實，再加上精準的分析與解讀，在此基礎上，方有可能做出正確可信的研究成果。如果從此一角度觀察，將會發現現有的許多研究成果，或多或少的一些問題，舉例而言，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有關王安石新學的研究固然卓然出眾，開風氣之先，引領一時風騷，卻免不了也有百密一疏之處。在探討王安石思想淵源時，侯書上承胡適《記李觀的學說》——一個不會得君行道的王安石〉的觀點，認為李觀的思想影響了王安石，在胡適所提的證據之外，又增補了《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答王景山書〉的一段資料，用以證明李觀與王安石二人有所交往，這段資料說：

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閥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頁819）

這一章的主筆者以「李泰伯……某與納焉」為證，「說明王安石與李觀是有過交往的。」其實

此處的「某與納焉」，就上下文觀察，是「將我也納入其中」的意思。將其解為「我與（他們）有交往」，是錯誤的解讀，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

謝善元 1972 年的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李觀之生平及思想》（中文版 1988 年，北京中華書局）一書，很早已指出：

這一個結論下得太匆促，因為這位作者誤解了「某與納焉」這一片語的意思，而這一片語正是他得出李、王相識這一推論來的主要依據。事實上，這一片語所從來的那一段信裡，王安石只是提到收信人（王景山）把他和李觀及曾鞏放在一起，並未說他和李觀見過面。

（頁 156）

誠如謝氏所云，侯書對上述資料的錯誤解讀極為明顯，讀者只要通讀〈答王景山書〉全文即可知曉。但藉由這段資料建構而成的李、王學術思想有淵源關係的結論，其說法清楚具體，頗易掌握，更便於論述。因而自姜國柱《李觀思想研究》（1984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起，舉凡有關李觀與王安石的中文論文專著莫不接受，廣為引用，習焉不察，至今依然相沿未改。可以說，不正確的資料解讀造成錯誤的結論，甚至建構起虛幻不實的學術傳承關係，正如基礎不實的七寶樓臺一般，拆下來自然不成片段，但對「考鏡源流」講究事實的學術史研究而言，也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錯誤解讀之外，不加詳細考證即任意將王安石作品繫年，因而造成學術論述上的錯誤判斷。就學術研究而言，更是相當可怕的錯誤作法。以下即以王安石的人性說法為例。

王安石的性情論對宋代人性論的發展有極大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王安石有關性情的論文極多，《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所收的即有〈楊孟〉、〈禮樂論〉、〈性情〉、〈原性〉、〈性說〉；上述二書失收，見於《聖宋文選》的有〈性論〉、〈性命論〉、〈荀卿論上〉。這些論文或主張調和孟子、揚雄（〈楊孟〉）；或主張性情相反，應以禮樂教化來「修性」、「養性」（〈禮樂論〉）；或主張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或主張性者五常之太極，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情生乎性，而性不可以善惡言（〈原性〉）；或主張性相近，習相遠（〈性說〉）；或主張性善，性者五常之謂（〈性論〉）；或主張天授諸人曰命，人受諸天曰性（〈性命論〉）；或主張仁義為性（〈荀卿論上〉）。這些論文的主題都在探討人性，但各篇的主張又有所不同，甚至互相抵觸，究竟孰先孰後？孰是孰非？也莫衷一是，難以判斷。現存的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有二個系統，即《臨川先生文集》系統與《王文公文集》系統，再加上不屬於二系統中的《聖宋文選》，三個資料來源的共同之處是有關論議文字都未標明著作年代，因此難以判定這些資料的先後順序，也不易討論王安石人性論的先後發展。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王安石講學與學術的傳播可以分先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在仁宗嘉祐八年（1063）末迄英宗治平四年（1067），這段時期安石在江寧居母喪，後知江寧，同時也授

徒講學，其高弟陸佃即在這一時期從之游。後一時期在熙寧九年（1076）十月安石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另有一批學者從其講學。據陸佃的說法，前一講學時期，王安石的名作《淮南雜說》、《洪範傳》皆已完成，「語器言道」，令陸佃大為折服。蔡卞所謂「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名噪當時，也引發學者嚮慕，咸願從之學。侯氏《中國思想通史》即曾懷疑《文集》的卷六十五至七十諸卷，即《淮南雜說》。就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刊刻安石文集時，一併收入原本單行的《洪範傳》來觀察，此說的可信程度相當高。上述安石論性諸作，除《楊孟》及《聖宋文選》所收的《性論》、《性命論》、《荀卿論上》之外，其餘《禮樂論》、《性情》、《原性》、《性說》諸篇皆在其中。由於這些著作時間難以區分先後，因此探討王安石的人性論時，還是難以看出王氏人性思想的發展與變化情形，只能由學者根據相關文獻的比較，做出符合情理的推測與判斷，這是較為謹慎用心的處理方式。

但是，十年前出版的李之亮的《王荊公文集箋注》（2005年，巴蜀書社）一書，除了標點、箋注之外，每篇作品都標上了編年，此舉雖似有助於讀者的閱讀參考，若就研究立場而言，卻是極不妥當的作法。就以上述有關人性論的論文觀察，《箋注》謂《楊孟》「元豐中退居金陵時作」（頁980）、謂《禮樂論》「元豐初年居金陵時作」（頁1033）、謂《性情》「治平中居金陵時作」（頁1063）、謂《原性》「元豐中退居金陵時作」（頁1090）、謂《性說》「元豐中退居金陵時作」（頁1093）。見於《聖宋文選》的三篇中，《性論》失收，《性命論》、《荀卿論

上》二篇則未繫年。已繫年的五篇依據為何？《箋注》完全未作任何說明。除此之外，陸佃明言《洪範傳》完成於英宗治平年間，《箋注》（頁 992）仍沿襲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之誤，繫於神宗熙寧十年（1077），殊不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六，熙寧三年十月甲戌載：「安石嘗進所著《洪範傳》，上手詔答之，及奏事罷，因留身謝。」（總頁 2294，世界書局）安石奏進《洪範傳》的時間，史籍具有明文，其著作時間當更早，絕無可能晚至熙寧十年。就此而言，《箋注》此書未經考證即率爾繫年的作法，既可能誤導讀者，也不合適用為研究基礎。若不慎以其為據探研安石思想變化，其成果是否可靠，更是問題重重，難以想像。上舉《箋注》出現的現象並非孤例，類此問題，其實所在多有。

因此，研究王安石新學時，資料的蒐集，版本的考量，文獻的分析解讀，在在需要謹慎用心。唯有從根本上自我要求，在文獻使用上打下堅實的基礎，再通過嚴謹扎實的論證推理，才有可能做出具體且足以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此方能真正落實學術求真的目的。

本書所收有關王安石新學的論文，時間有早有晚，全都來自於筆者已發表於國內外各學術期刊的相關論文，結集成書時，亦曾分別做過或多或少的修改與改寫。除了有關王安石新學本身的探討之外，另有道學家對王氏新學的批評。由於道學家從二程開始即以王安石為主要對手，對王氏新學的批評也最廣泛與深入，對理解王安石新學理論的優缺點有極大的幫助，過去注意及此者較少，因此本書分別收入二程、楊時與朱熹對新學的三篇論文，亦可觀察道學家在

不同階段的批評重點。希望藉此對曾為北宋官學，並曾主導學術發展達數十年的王安石新學研究，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藉以發潛德之幽光。

筆者從事教學研究數十年之久，除了師長前輩的教導與鼓勵之外，內人黃懿梅教授的全力支持與激勵，一直是最大的精神支柱，四十年如一日，更令人心存感激。無以為報，謹以此書為獻，並致最誠摯的謝意。

民國一〇四年三月序於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

王安石新學探微 目次

一道德以同風俗——王安石新學的歷史定位及其相關問題·····	一
「丹青難寫是精神」——讀王安石的詠史詩·····	四三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論王安石〈明妃曲〉·····	七三
王安石的聖人論·····	一〇一
王安石思想與道家的關係——以老子為例·····	一四一

從「斷爛朝報」到罷廢史學——王安石新學對宋代學術的一個影響……一六九

「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二程論王安石新學……二〇九

「安石力學而不知道」——楊時論王安石新學……二五一

「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躔不免於非」——朱熹論王安石新學……三〇一

近人有關李觀與王安石關係諸說之商榷……三四五

一道德以同風俗——王安石新學的歷史定位及其相關

問題※

一、前言

王安石（1021-1086）新學是道學興起之前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從北宋神宗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在位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三經新義》，不僅學校誦習，科舉用以取士，也始終是朝廷認可的官學，在宋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宋室南渡後，由於時論將北宋敗

※ 本文撰寫期間曾接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初稿曾在 2007 年 8 月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及西北大學文學院合辦「第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經修訂後正式發表。謹此一併致謝。

亡的責任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加以道學興起，人才輩出，聲勢日盛，終於完全取代新學，成為宋代主要的代表學術。這也使得曾經如日中天、盛行一時的王安石新學因而走入歷史，不再是學界注意及討論的對象。

王安石新學雖曾為宋代的顯學，不僅有過輝煌的過去，也曾引領一時風騷，對當時學術極有影響。但南宋以來討論宋代學術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如不著撰人的《諸儒鳴道集》、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李心傳的《道命錄》、元修的《宋史·道學傳》以及黃宗羲、全祖望等的《宋元學案》，全都以道學傳承為學術主流，完全無視於王安石新學曾為官學，更曾流行數十年之久此一客觀事實，殊為可惜。學術研究本以求真，存亡繼絕、發凡起覆以還歷史的原貌，更是從事研究工作者戮力以赴的理想。在討論過道學的成立與發展之後，本文預定以王安石新學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學術思潮的歷史地位及其與道學發展的關係，希望藉此對宋代慶曆至慶元時期的學術發展，能有更清楚的理解與掌握。

二、「一道德以同風俗」的內涵

何謂「一道德以同風俗」？這個名詞並非宋人所創，早在先秦時期即已出現，《禮記·王制》云：